

新清华文丛之二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中国宗教与文学 论 集

葛兆光 著

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I 101.33
6334

新清华文丛之二

**The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

葛兆光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葛兆光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4

(新清华文丛, 2)

ISBN 7-302-02902-4

I. 中… II. 葛… III. 宗教-影响-古典文学-中国-文集
IV. I207.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170 号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校内, 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84 千字

版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2-02902-4 / I·19

印数: 0001~3000

定价: 13.50 元

出版说明

清华大学中文系自 80 年代中期复建伊始,即以整理研究清华人文学科历史为起点,探索学科发展道路。于是有《清华文丛》行世,凡 5 载共 8 部,为学术界所瞩目。1995 年纪念建系 70 周年、复建 10 周年之际,系内同仁以为,沧海桑田,今非昔比。新中文系应旧中求新,旧中出新。于是不揣浅陋,又有以收录近年清华学人新作之《新清华文丛》呈献于学界同仁面前,以求晒正。吴宓学长曰,新未必比旧好,旧未必不如新。本丛书辑录之著作亦当作如是观。老清华人文学科以古今会通、中西会通为特色,在微观上谨严,宏观上开阔,谨守历史真实且有鲜明的时代新意。《新清华文丛》的诸书风格殊异,惟其志向即继承传统,以谨严科学之治学态度回答新学术课题。

《新清华文丛》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国际汉学研究所主编,邀请校内教授(含双聘教授)组成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为(姓氏笔划为序):王中忱、张岂之、李学勤、何兆武、徐葆耕、蓝棣之、葛兆光、董士伟、钱逊、蔡乐苏。执行编委:徐葆耕。



葛兆光 原籍福建，1950年生。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历史文献学博士导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古代诗文要籍详解》、《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唐诗卷》、《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等学术著作，以及随笔集《门外谈禅》、《佛影道踪》、《考槃在涧》等。现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文化名著导读”、“中国宗教与文学”、“中国思想史”、“文化问题专题”、“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等课程。

內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佛教、道教对文学的影响的著作，它的内容主要范围是在古代宗教史与古代文学史领域。作者以较丰富的文献资料，讨论了中国古代的佛教和道教在艺术想象、文学语言和故事主题等方面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所选择的切入角度和论述方式，都是比较有意义的。

目 录

导言：重理中国宗教与文学之因缘·····	1
第一章 体验与幻想：宗教经验对中国文学的渗透·····	20
第二章 “不立文字”与“神授天书”：佛教与道教的语言 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42
第三章 青铜鼎与错金壶：道教语词在中晚唐诗歌中的 使用(个案研究之一)·····	64
第四章 禅意的“云”：唐诗中一个语词的分析 (个案研究之二)·····	93
【附录一】佛教语言与诗歌语言·····	110
【附录二】关于转读的札记·····	125
第五章 从出世间到入世间：中国宗教与文学中理想 世界主题的演变·····	136
第六章 死亡之恐惧及其消解：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 中死后世界主题的演变·····	177
第七章 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现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困境···	198
后记·····	220

导言：重理中国宗教与文学之因缘

如果我们不把古代文人那些偶尔感悟的话语看成是严肃的学术研究^{〔1〕}，那么，对于中国宗教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认真思考和深入发掘，却最多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最早成果大多是从宗教研究引出的，比如说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对佛教史发生兴趣的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就谈到了中唐密宗壁画对“诗人兴象”的感染^{〔2〕}，而总是想写一部中国佛教史的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第六节就讲到了佛经翻译影响一般文学的三个方面^{〔3〕}。20年代以来，白话文学成为话题，又适逢敦煌文书逐渐面世，这一轰动世界的发现既引起了国际学界对于佛教与佛教文学的注意，大量变文俗讲资料又恰恰对应了当时挣脱传统文学、为白

〔1〕 例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院便送归江陵序》中说信仰佛教的僧人，他的文学语言就会“偷然以清，粹然以丽”。《刘禹锡集》下册，394页，中华书局，1990。

〔2〕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七，280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3〕 收入梁氏所著《佛学研究十八篇》，176～181页，中华书局重印本，1989。

话文学寻根溯源的潮流^{〔1〕}，于是，关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就不仅是宗教研究的话题，逐渐也成了文学研究的话题，除了胡适^{〔2〕}、许地山^{〔3〕}、陈寅恪^{〔4〕}等少数几个兼治宗教与文学的专业学者外，相当多的文学研究者也在讨论这一话题，相当多的文学史著作也开始关心这一话题了。

宗教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启发，敦煌资料给文学研究的刺激，加上东西方思想与学术的交流，使很多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宗教与文学的因缘。特别是那些关心比较文学与文化，试图使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研究者，他们更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放在文学的世界格局和文化的东西交流的意义，给予特别的评价。像特别希望与传统文学划清界限、为当下的文学革命寻找依据的胡适，就曾在一次题为《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的演讲中特别说到，“中国受了印度不少的影响，如小说、诗歌、记事之故事等等，都是受了她的熏染与陶冶的”，这一思路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也反复出现^{〔5〕}，而注重文学里面的外来因素和民间背景，并且对敦煌文献极其关心的郑振铎，

〔1〕 关于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最早提及的是1924年罗振玉在《敦煌零拾》中为《佛曲三种》所写的跋语，其中提到佛曲与宋代说话的关系。而较全面的论述敦煌佛教文学意义的，是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一文，载《小说月报》第20卷3号，后收入其所作《中国文学史》第三篇第三章。

〔2〕 胡适涉及宗教与文学的论文，如《白话诗人王梵志》，载《现代评论》6卷156期；《西游记考证》，1921年刊于《读书杂志》第6期，1923年修订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3〕 许地山关于宗教与文学类的论文，如《中国文学所受印度伊兰文学的影响》，载《小说月报》16卷1号，1926；《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载《中国文学研究》下册，1927。

〔4〕 陈寅恪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很多，如《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2分，1930，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国志曹冲华陀与印度故事》，原载《清华学报》6卷1期，1930；《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5日。转引自《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就一再地强调中国文学史中的印度佛教背景,在其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中世文学鸟瞰》一章里甚至把从东晋到明代中期一千二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都说成是在印度尤其是佛教笼罩和启发下的成就^{〔1〕}。当然,宗教对于文学的具体影响,则需要有深入的个案研究,只有当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学术研究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准,印象中模糊的图景才会逐渐清晰,笼统的结论才会渐次坚实,所以当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成绩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细节时,在一大批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才有了关于宗教与文学的翔实而精致的叙述。例如早期佛经翻译的影响,早在1918年,谢无量曾在《中国大文学史》中,曾经专门设立了《南北朝佛教之势力及文笔之分途》一章,并在第一节中讨论了佛教译经与义学对中国文人的影响^{〔2〕},但是,尽管他曾撰写过《佛学大纲》,由于当时学术界对此尚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印象式说法尚嫌过于笼统与模糊。到1929年,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出版,由于参考了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的说法,他对于释典的翻译,就比前述谢无量氏的著作一笔带过要详尽得多^{〔3〕},不仅根据梁启超的提示,指出了佛经中有《佛所行经》和《大乘庄严论》这样类似长诗和小说的作品,而且指出了佛经翻译的文体和想象对中国的刺激;而佛教对齐梁文人认识声律的启发,在谢无量、谭正璧书中并没有论述,仅说到“永明文学,承元嘉之后,更研钻声律”^{〔4〕}、“诗到了

〔1〕 “因了印度文学的输入,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戏文、像小说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了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究竟要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却是无人能知的。”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227页,北平朴社,1932。

〔2〕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五,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18。

〔3〕 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75~80页,上海,光明书局,1929。

〔4〕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五,17页。

齐，渐走入律诗这条路上去”^{〔1〕}；而在1934年出版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由于看到了陈寅恪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四声三问》，所以才提到了佛教与文学的这段大因缘^{〔2〕}，而1941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进一步依据陈氏的研究，提出了他的推断：“中国语音既不适宜于佛经的转读与歌赞，欲达到此种目的则必须参照梵语的拼音，而求汉语适应的转变，于是二字反切之学因以进步，反切盛行，声音分辨乃趋于精密与正确，因此四声得于此时成立。可知魏晋虽有人从事声韵的研究，而至齐梁大为兴盛者，实有受佛经转读的影响”^{〔3〕}。

二

在20年代到40年代这30年间(1920—1949年)，其实关于中国宗教与文学，不仅综合研究范围已经相当广泛^{〔4〕}，个案研究的内容也已经相当的深入。小说方面，比如关于《西游记》故事以及其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来历，就有鲁迅、胡适、陈寅恪的考证，对于敦煌佛教俗文学资料与中国小说的关系，在罗振玉含糊的指陈之后，也有了向达《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及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傅芸子《〈丑女缘起〉与〈贤愚经〉

〔1〕 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73页。

〔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163页，北平，人文书店，1934。

〔3〕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285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重印本。

〔4〕 例如关于宗教与文学在感情上的共通性和精神上的一致性，可参见周作人那篇著名的《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2卷1期，1921。关于中国文学所发生与成长的思想世界，可参见朱维之的《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一个鸟瞰》，载《金陵神学志》，1940年12月10日。关于佛教对于中国小说的影响，则更有相当多的精彩考据和论述，如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中就推测中国小说的起源与传讲佛经有关。

金刚品》等精细的长篇论文^{〔1〕}，而传世文献中的唐代传奇与佛教的关系，霍世休 30 年代所作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对梦境、离魂、还魂、幽婚、人神之恋等等题材的讨论，则已经基本奠定了至今还在应用的研究模式^{〔2〕}；诗歌方面，除了胡适在寒山、王梵志等佛教通俗诗人那里为白话诗寻找源头的研究外^{〔3〕}，关于佛教转读与中国古典诗歌四声的关系，也出现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这样至今仍很难逾越的论文^{〔4〕}。由于当时这一话题刚刚开始，空白尚多，加上研究者学识深厚，所以往往每一论著，就开出一片新的领域，给后来人留下了继续研究的范式与课题，这可以用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为例，此文本身仅仅涉及的是《西游记》中三个角色的故事来源，对这三个角色的故事来源的分析也不免简略，但陈氏却希望在这三个类型的分析中，给后人提供三个外来传说在中国文学中“演变之公例”，所以他才“考其起原，并略究其流别”^{〔5〕}。

“考其起原，究其流别”，是当时个案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关于中国宗教与文学的研究中，最具有特色也是最具有深度的，就是历史溯源的研究。比如鲁迅对于孙行

〔1〕 向达《论唐代佛曲》首先论证了佛曲与俗讲变文的不同，原载《小说月报》20 卷 10 号，1929。《唐代俗讲考》则详细考证了唐代佛教俗讲的体制及其文学，原载《燕京学报》16 期，1934，此后又不断修订，这两篇论文后均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1987。孙楷第文刊于《国学季刊》6 卷第 2 号，北京大学，1937。傅芸子文刊于《艺文》，1943。

〔2〕 这是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所作的论文，原载《文学》2 卷 6 号，1934。

〔3〕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新月书店，1928。

〔4〕 《四声三问》，原载《清华学报》9 卷 2 期，1933。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后虽有饶宗颐《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提出异议，但相当多的文学研究者仍沿用陈说。饶文原载《中国语文研究》，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金明馆丛稿二编》，196 页。

者源自无支祈的说法、胡适关于孙行者来自哈奴曼的见解、陈寅恪关于《西游记》闹天宫与佛教顶生王故事和印度罗摩延传奇的关系，其实都是这种历史方法的使用。同类的作品还有一些，比如刘铭恕的《唐代文学起源于印度之点滴》、苏雪林的《天问里的印度诸天揽海故事》、季羨林的《一个故事的演变》、《木师与画师的故事》、《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等等〔1〕，在这种历史溯源的研究中，中国文学中所含有的宗教因子一一被清理出来，这一一清理出来的含有宗教渊源的文学作品就成了后来人分析的基础。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想法，既然宗教中常常有以故事解经的传统，那么在文学上看，它就与小说一样，是同类的著作，而这些同类的著作，其演变滋乳的过程就常常相近，而且往往互相渗透，如“六朝维摩诘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再追问下去，那么就要考察这些文学作品的存亡兴废与中国的宗教心理的关系，他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就曾以中国佛教哲理经典与哲理小说的湮灭，及佛教通俗经典与感应报应一类小说的兴盛为例，感慨“岂以支那民族素乏幽渺之思，净名故事纵盛行于一时，而陈义过高，终不适于民族普通心理所致耶？”〔2〕

可是，这种历史溯源的研究一面需要研究者对宗教与文学两类文献的谙熟，这样才能发现中国文学作品中暗藏的印度色彩和佛教因素，一面需要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有一个理论的思考，这样才能在纷繁的线索中找到演进的“公理”和变化的“根源”。这是很困难的，前者需要对宗教文献和文学文献刻苦的研读，而后者，即对“公理”的推论，既要有理论的思考，又要有充分的资料发

〔1〕 刘铭恕文，载《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苏雪林文，载《东方杂志》40卷9期，1944。季羨林文，原发表于《北平时报》1946年12月25日、《大公报》1947年9月10日等等，后集于《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 载《金明馆丛稿二编》，185页。

掘,对“根源”的分析,既要有总体的心理体验,还要有合理的思路。因此,除了少数杰出的学者之外,大多数研究或大而化之地走马看花,或具体而微地拈针绣花,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学科在其初创时不可能那么成熟。所以,当我们回顾当时的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时,我们如果要挑剔前人的问题,说他们的研究中有什麼使后人感到不能满意的,那么,可以指出的就只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印象式的概说常常作为一种常识,在不证自明中被人接受,并作为下一轮论述时的起点。例如,朱维之对中国文学的宗教背景的鸟瞰,就不免粗略,说儒教是统治阶级的宗教,所以在正统文学尤其是散文方面“有绝大的权威”,而说道教是平民的宗教,所以在“诗歌及平民方面占了优势”,这就颇为片面。在当时关于道教与文学的文献资料尚无深入发掘的时候,作此大胆的判断,尽管结论也许并不一定会错,但缺乏实证,不免蹈空凌虚,过于相信直觉的感受了。

其次,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视野,大多被局限在经典文献中的传说故事为中心的范围,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走向,也被确定在从宗教到文学。于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个故事,出自佛教的某一部经典,成了最主要的历史溯源的途径,从后者到前者的演变,成了探索宗教与文学关系最重要的形式,研究者很少能考虑其他方面,如宗教仪式中的刺激与经验、宗教节日中的演剧和集会、宗教经典中的语言与逻辑等等对文学的影响,也很少能反过来思考文学作品对宗教经典文本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是极明显的,在佛教译经时,中国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就已经渗入了佛教信仰的表述,在唐宋以后逐渐成书的道教经典中就暗中采用了相当多的唐宋诗文的表现技巧。

再次,应该指出的是,在这 30 年的研究中,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大大超过了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这里的因素很多,其中最

重要的大约有三方面：第一，中国的宗教与文学研究者尽管不时地提出关注民间非主流文学的口号，但实际上对于经典的、上层的、在历史文献中传播的文学更加关心，他们在心理上对道教的偏见与歧视，其实来自他们人生情趣和生活态度，比如尽管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其实他自己的注意力也还是佛教。第二，20世纪中国学术的进展，常常与国际学术动向相关，在20世纪的美、德、法、英、日，印度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学科，宗教学也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学科，语言与历史的科学方法则使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佛教研究正是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来实验科学方法、糅合印度学成就与宗教学进境的最佳领域之一，所以是当时各国汉学界的一个热门，这种风气显然影响我国的学者，如汤用彤、陈寅恪、许地山等人都是在外国学成归来的，而当时中国敦煌的重大发现，更使这一领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所以佛教与文学的研究自然也水涨船高，日趋兴盛。第三，近代对中国影响极大的日本，当时并不特别重视道教研究，但是它的佛教研究水平则极高，日本所编撰的《佛教大辞典》、《佛书解说大辞典》、《大正新修大藏经》以及其他的佛教书籍，曾给了中国研究者极大的方便，无形中刺激了佛教的研究，而道教的经典即《道藏》，直到民国十三年至十五年（1924—1927年）才由涵芬楼影印，比起分册精装的《大正藏》来，其不便研究，一眼可见，至于研究道教之工具性图书，则几乎一片空白，唯有一部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还是明代道士所作。所以，道教与文学关系之研究，一直相当的落后，就连曾经研究过道教，写过《道教史》上册的许地山，都没有专门论述道教与中国文学的论著，直到1940年，才有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问世^{〔1〕}。

〔1〕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商务印书馆，1940。

三

应该承认的是,在此后又一个 30 年,也就是从 1949 年到 1979 年,祖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境甚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宗教与文学的研究思路大多被意识形态意味很强的文学批评所影响,文学家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被不加分析地预定是一种有害的东西,碰到这类现象,总是一通批评了事,并不能作同情的分析和理智的研究,于是,只有文献考据和历史溯源的实证研究还在宗教与文学研究这一领域中积累了一些知识性的成就^{〔1〕}。直到 1979 年以后,宗教与文学的研究才又一次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论著,如《唐音佛教辩思录》、《佛教与中国文学》、《想象力的世界》、《禅与诗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等等^{〔2〕}。

比起过去的两个 30 年,这个时期祖国大陆关于宗教与文学研究,似乎有一种试图全面论述和总结的趋向。这时,不仅出现了综论宗教与文学的论著,比如《佛教与中国文学》就从汉译佛经的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的交往、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一直讨论到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思想内容,《想象力的世界》对唐代文学与道教的论述,也涉及了道教与唐代文人的交往、小说、诗、词等体裁中的道教影响及道教方法与文学幻想。同时,对于过去相对研

〔1〕 举几个例子,如王重民、向达等选录与校订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常任侠编注的《佛经文学故事选》,原成于 1957 年,后由上海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季羨林《印度文学在中国》,原作为教材,写于 1958 年,后正式发表时,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2〕 陈允吉:《唐音佛教辩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究较少的道教与文学,各种著作也逐渐问世,除了《想象力的世界》之外,还有钟来因的《唐代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赵明的《道教思想与文学》、詹石窗《道教文学史》以及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四卷本中的第八编《文学艺术》等等^{〔1〕},关于道教的思想与文学表现、关于道教宗教经验对于文学的刺激、关于道教传说故事给予文学的内容,也都有所论及。同样,过去几乎很少有人问津的宗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也出现了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朱晓进《转型期的文化启示录》、陆草《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谭桂林《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等等虽嫌粗略但仍是筚路蓝缕的作品^{〔2〕},甚至在过去一片空白的宗教与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有了樊星题为《叩问宗教——试论当代中国作家的宗教观》这样的论文^{〔3〕}。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出现了哲学和心理分析的理论趋向,当时蜂拥而入的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研究者的影响很大,“生存超越”与禅宗的自由境界、“原型意象”与文学的永恒母题、“原初之思”与诗论的言意之辩、“原始思维”与中国的诗歌构思等等,都在这一时期中被提出来,使中国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了虽未必深刻但相当复杂的理论意味。于是,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在过去的和近年的研究论著中,渐渐地有了一个大致成型的资料基础、论述轮廓和理论框架。

〔1〕 钟来因:《唐代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载《文学遗产》1985(3),北京;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4卷本中的第8编《文学艺术》,知识出版社,1994。另,赵明《道教思想与文学》,詹石窗《道教文学史》等,也都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

〔2〕 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载《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朱晓进:《转型期的文化启示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陆草:《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载《文学遗产》1989(2);谭桂林:《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载《文艺评论》1993(4)。

〔3〕 载《文艺评论》1993(1)。